



新中国 60 周年丛书

起点

亲历中国改革开放

● 《炎黄春秋》经典文章
● 改革开放亲历者的心声

吴思 李晨 主编

新华出版社

起点

亲历中国改革开放

吴思 李晨 主编



新华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起点：亲历中国改革开放/吴思，李晨主编

北京：新华出版社，2009.5

ISBN 978-7-5011-8788-1

I. 起… II. ①吴…②李… III. 改革开放—历史—中国 IV. D6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9) 第 064810 号

起点：亲历中国改革开放

责任编辑：贾晓伟 王 婷

装帧设计：伍民力

出版发行：新华出版社

地 址：北京石景山区京原路 8 号

网 址：<http://press.xinhuanet.com> <http://www.xinhuaupub.com>

邮 编：100040

经 销：新华书店

照 排：新华出版社照排中心

印 刷：北京新魏印刷厂

开 本：710mm×1000mm 1/16

印 张：18.25

字 数：260 千字

版 次：2009 年 5 月第一版

印 次：2009 年 5 月第一次印刷

书 号：ISBN 978-7-5011-8788-1

定 价：36.00 元

本社购书热线：(010) 63077122

中国新闻书店电话：(010) 63072012

图书如有印装问题，请与印刷厂联系调换 电话：(010) 89203231

序言：站在新三十年的门口

杨继绳

无论是历史学家、经济学家还是社会学家，无论是政治要人还是寻常百姓，无论是中国人还是外国人，对中国 30 年发生的社会变革无不有着极大的关注。一个 13 亿人口的大国，在没有大的社会震动的情况下，发生了如此全面而深刻的变化，实现了如此重要的社会进步，这不能不说是一个奇迹！在这场巨大而深刻的社会变革过程中，演出了多少使人心灵震撼的历史活剧！融化了多少悲伤、壮烈、激动和喜悦！留下了多少令人深思的问题！难怪不同国籍的作家、记者、学者们，纷纷用不同的语言和不同的思维方式，著述这将在人类历史天幕上留下重要痕迹的 30 年。今年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 60 周年，改革开放是第二个 30 年。现在我们已经进入了第三个 30 年，站在新的 30 年的门口，重新反思刚刚过去的 30 年是非常必要的。

从中国改革的历史看中国改革的目标

在 20 世纪这短短的 100 年内，人类的经济制度经历了一个螺旋式的上升。从 19 世纪承袭下来的自由资本主义，以其富有激励性的市场机制，空前地调动了人类的创造力，使生产力奇迹般地发展，积累了巨大的财富，刷新了整个社会面貌。但是，它也曾一次又一次地造成了资本主义社会的危机。20 世纪初，人类面对早期资本主义的社会危机作出了种种思考和实践探索，其中变为大规模社会实践的有四条道路：

法西斯主义是第一种实践。希特勒提倡“国家社会主义”，用政府的权力来消除不平等，在经济上对大股份公司实行国有化，否定自由企业制度和市场经济，实行高度集中的、国家垄断的统制经济，承诺维护工人阶

级的利益。为了实现其“国家社会主义”理想，他采取秘密警察和集中营的恐怖手段镇压反对者；反对民主，扼杀人权。法西斯的实践给人类带来了灾难，已经被人们唾弃。

北欧的民主社会主义是第二种实践。它主要是吸收第二国际的思想遗产。“二战”以后，社会民主党在联邦德国、瑞典、挪威、芬兰等一些国家执政。它的主要特征是：放弃无产阶级的暴力革命，实行和平过渡；实行民主政治，反对专制主义；靠市场力量配置资源，国家对经济实行调控，不实行国家所有制；实行“从摇篮到坟墓”的社会福利计划。

资本主义自身的完善和改革是第三种实践。资本主义制度实际是组织社会生活的一种制度体系。这种制度体系是经过人类几百年的探索、实践和试验逐渐演变而成的。它不是一成不变的。在20世纪，比较突出的改革要算“一战”前夕英国的劳合·乔治的社会政策和1935年美国的罗斯福新政。其主要内容是：1. 工会不断发展，逐渐成为一支社会平衡力量；2. 实行广泛社会保障制度；3. 在市场无效、无力的领域，国家干预经济，用政府“有形的手”来补充“无形的手”；4. 私人独资企业逐渐变为股份制公司，股票分散化，所有权社会化；5. 经理阶层取代了私人资本家的管理权力，大企业再不是由资本家本人来管理，而是由有专业知识的管理人才来管理。这些变革无疑是吸收了社会主义的一些内容。

以苏联为代表的社会主义是第四种实践。二战以后，苏联式的社会主义制度在十几个国家掌握了政权。由于高度集中的政治体制和经济体制能够动员全社会的财富，因而使一些落后国家迅速实现了初步的工业化。在1929年前后的资本主义经济危机时期，一些西方知识分子也崇尚这种社会主义。但是，从60年代以后，这种社会主义制度，越来越显现出它的不足。它不能有效地吸纳20世纪新技术革命的成果；没有力量进行有效的资源配置，经济发展缓慢；无休止的内部政治斗争耗尽了精力；在辉煌表象中掩盖着深刻的危机。由于经济垄断、政治垄断、思想垄断，内部危机日益深重，苏联解体，东欧剧变。

邓小平同志曾经对波兰前领导人雅鲁泽尔斯基说：“我们两家的政治体制都是从苏联模式来的。看来苏联模式也不是很成功的。”^①通过人类在

① 邓小平：《根据本国情况进行政治体制改革》，1986年9月29日，载《建设中国有特色的社会主义（增订本）》，第144—145页，人民出版社，1987年3月第二版。



20 世纪 100 年的实践，中国的改革目标很明确：从苏联那一套模式中走出来，进入人类的主流体制，即民主政治，市场经济。这一点应当是没有争议的。

中国的改革是成功的

改革以前的上世纪 70 年代末期，中国的农村一贫如洗。不仅农民家中一无所有，连村子周围的树木都砍光烧尽。有一个令人震惊的数字：1978 年，全国有 $\frac{2}{3}$ 的农民生活水平不如 50 年代，有 $\frac{1}{3}$ 农民的生活水平不如 30 年代。

处于工农差距有利一方的工人怎么样呢？以天津为例：1975 年，工厂的生产第一线 70% 以上是二级工，月薪为 41.5 元，再没有其他收入。职工家里没有任何财产，成了名副其实的“无产阶级”。1950 年，天津人均住房面积 3.8 平方米，1972 年，下降到 3 平方米。50 年代初为工人修建的工棚式临时住宅，一直住到 80 年代后期。

除了贫穷以外，还有不自由。

为摆脱原来体制造就的危机，30 年来，主要进行了以下改革：

一、所有制改革。国企改革（竞争性企业民有化，国有控股企业吸收非国有资本）；发展私有经济；建立以国有经济为主导的各种经济成分并存的混合经济；由单一公有的利益主体到利益主体多元化。

二、价格改革。由政府定价到市场供求关系决定价格。

三、建立市场体系、商品市场、技术市场、金融市场、土地市场等各种生产要素市场。

四、建立市场经济的法治体系。

五、宏观调控体系重建。金融、财政、税收等方面的改革。

六、社会保障体系构建。

七、对外开放。吸收国际资源利用国际市场，中国经济和世界经济连为一体。

改革大力推动了经济发展。30 年来，中国的 GDP 平均每年以 9.8% 的速度增长，经济总量超过了法国、英国和德国，在世界处于第三位。中国人口从 1978 年的 9.6 亿增加到 2007 年的 13.2 亿，增加了 3.6 亿，而人

均国民总收入（即人均 GNP）还是由 378.7 元增加到 19033 元，增加了 49 倍。改革 30 年，中国从一个人均国民总收入 199 美元贫困的低收入国家，走到了人均突破 2000 美元中等偏低收入国家，排名由 175 位上升到 129 位。

最有意义的是配置资源的方式转变。在行政力量配置资源的 1958 年，为了使钢铁的年产量达到 1070 万吨，倾全国之力，闹得得不偿失。配置资源的方式转向了主要由市场力量配置以后，钢产量不声不响地从 1978 年的 3178 万吨，增长到 2007 年的 48966 万吨。从 2000 年开始至今，中国的钢产量一直居世界第一位。这些活生生的数字显示了增强社会活力的巨大意义。

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30 年来，在政治上也有重要的进步：1. 以阶级斗争为中心转变为以经济建设为中心；2. 废除了地、富、反、坏、右等政治身份，各类人政治上一律平等；3. 废除了领导干部终身制；4. 由家长式的全能政治转变为共治式的威权政治，由一个人说了算到集体负责制；5. 中央和地方分权，地方有相对独立的利益，有相对独立的事权和财权；6. 对意识形态的控制有所松动，舆论一律的情况有所改变。以上这些，使中国人的自由度也比过去大大地提高了。

还有很多需要解决的问题

中国虽然初步建立了市场经济体制，但很不完善；中国的政治虽然比过去有进步，但离民主政治还有相当长的距离。由于行政权力过度扩张、政治过度干预经济，甚至有的权力进入了市场，中国当前的市场经济可以说是“权力市场经济”。

经过 30 年的改革开放，改革前的社会不公正问题有的解决了（以政治身份来确定其社会地位），有的没有解决（如城乡身份问题）。改革以后又出现了新的社会不公正。进入 80 年代后期，社会公正问题就开始显露，到 90 年代中期以后，社会公正问题更显突出。改革期间的社会不公正的根本表现是，对改革的代价承担和对改革的收益分享错位。改革中获益最大的是各级掌权者及其亲属和朋友，改革收益较小的是工人和农民。而对改革的成本和风险的付出，后者比前者大得多。社会不公正具体表现为以

下几个方面：贫富差距过大；官员腐败严重；国企、医疗、教育、住房改革某些方面失当，甚至损害了底层群众的利益。改革中，一方面不断强化和扩大党政机关的利益，另一方面却在有些领域推卸国家财政应当承担的责任。

改革中形成的既得利益群体形成了强势，他们利用这种强势左右改革的政策和措施，使他们在改革中得到更多的利益。没有改革的政府部门，按照自己的要求，订立自己的改革目标，实施自己的改革措施，把改革向有利于自己利益的方向推进。“改革目标部门化，部门利益政策化。”这样，社会不公正问题会更加严重，社会矛盾会更加尖锐。

当今，中国人不得不面对两个现实：权力没有被制衡的上层建筑；资本没有被驾驭的经济基础。人们经常谈论我们面临两个矛盾：官民矛盾和劳资矛盾。官民矛盾是权力没有制衡的结果，劳资矛盾是资本没有驾驭的结果。

以上问题不是改革产生的，而是改革不到位产生的；不是市场化的结果，而是市场规则受到没有改革的权力体系破坏的结果。这些问题只有进一步深化改革才能解决。

目标：民主政治加完善的市场经济

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到今年已经60年了，这60年可以划分两个30年。前30年建立了高度集权的政治体制和经济体制。在这种体制下，一度经济发展较快，依靠自己的力量，初步建立了独立的工业体系，但这种体制限制了各方面的积极性和创造性，经济缺乏活力，与国际差距日益拉大，还出现了三年大饥荒、“文化大革命”等一系列的重大失误。后30年对前30年的制度进行改革，形成了“威权政治加不完善的市场经济”的社会体制。在这种社会体制下，经济高速发展，国力大大增强，但出现了社会不公正的问题，从而引发比较尖锐的社会矛盾。又一个30年来了，它的目标是什么呢？当然，初步建立的市场经济体制需要进一步完善，在政治上，正如胡锦涛总书记多次强调的，加快民主进程。也就是说，今后改革的目标是“民主政治加完善的市场经济”。

下一步改革面临的任务是建立制衡权力和驾驭资本的社会体制。在驾

驭资本和制衡权力两个方面，制衡权力当然是主要的一面。制衡权力是指监督公权、限制公权的活动范围，阻止公权进入市场交换领域。制衡权力就需要建立民主政治制度。

资本是一种强大的社会能量，它推动技术进步、推动社会发展。资本投到哪里，哪里就改变面貌。但是，资本是贪婪的。这种贪婪性用经济学的语言可表达为“追求利益最大化”。在利益面前，资本是没有人性的。近200年来，批判资本罪恶的著作汗牛充栋，其中马克思的最为深刻。我们今天在利用资本、享受资本之惠的时候，却忘了资本的另一面。自上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中国生产要素资本化和劳动力雇佣化同时并进。在市场经济条件下，资本总是占主导地位。从高级工程师到普通产业工人，都可能是资本雇用的劳动者。一些自诩为“知本家”的工程师们，在经济寒流中也被“资本家”解雇而失去饭碗。普通劳动者的利益更是经常受到损害。为了追求利益最大化，资本总是千方百计地侵占和损害企业外部的利益，三废横流、大气污染、环境破坏，正是资本肆虐的结果。资本收买权力，收买舆论，用资本原则代替了政治原则和道德原则。各种保持社会平衡和稳定的公共规则被铜臭锈蚀，“潜规则”广泛取代了“显规则”。资本原则进入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冰冷的金钱关系取代了人情的温暖。

马克思主张消灭资本，目前资本是不可能也不应当消灭的。孙中山提出“节制资本”，“节制”有点过分，会限制资本的积极方面，还是驾驭资本比较合适。驾驭资本，就是建立一套制度体系，既使资本能比较充分地发挥它的积极作用，又能限制其贪婪性对社会的危害。现代民主制度就是驾驭资本比较有效的制度。这是劳动和资本经过千百次博弈产生的制度，是社会实践在千百次试验中产生的制度。从限制资本对劳动的奴役这个角度来看，必须提出加速民主化的问题。

无论是制衡权力，还是驾驭资本，都需要民主政治制度。从这里引出必须加速政治体制改革的结论。

不错，政治改革是有风险的。然而，如果不自觉主动改革，最终还得被迫变革。对国家和民族来说，自觉改革比被迫变革的代价要小得多、安全得多。所以，政治改革要采取积极的态度。但是，政治制度的转变不能过于激进，不能过于急切。激进和急切的做法可能使社会失控。一旦激进的民主主义和无政府主义者的过激行动使政权失去控制社会的能力，社会



就出现无序，此时专制者就会应运而生。因为专制是结束社会混乱、建立新的秩序最有效的手段。那些不堪忍受无政府状态的老百姓，就像欢迎救世主一样欢迎专制者。这样就可能出现暴民和暴政的恶性循环。政治改革需要政治智慧，要善于选择时机、利用时机。政治改革最好是在法制的轨道上有序地前进。

我们听到过很多关于历史的说法：“历史是一面镜子”，“历史使人明智”，“一个不能面对自己历史的民族是没有未来的民族”，等等。这些说法都向人们表明历史是多么重要。但是，在旧时代，“私撰国史”是有罪的，修史是官家的事。因此，旧时代的史书大都是为官家歌功颂德的文字，存留民间的野史弥足珍贵。但野史由于著者条件的局限，有时失之偏颇和狭窄。这本书的作者中的很多人参与了改革以来重大事件的决策，退休后经过沉静反思，其文章是在“处江湖之远”的晚年追思“居庙堂之高”的经历。既有官家的宏观视野，又有民间的客观冷静。

这本书里所选的文章记录了中国改革开放中一个又一个重大事件，发表于著名的历史类杂志《炎黄春秋》。《炎黄春秋》是追求历史真实的刊物，多年来，它既致力于匡正过去历史教科书的偏误，又致力挖掘过去年代有意或无意掩盖下的真实历史。这本书是从《炎黄春秋》中精选出来的，真实性和权威性应当是这本书的特点。

2009年3月

作者系《炎黄春秋》杂志社副社长

目 录

序言：站在新三十年的门口	杨继绳(1)
--------------------	----------

一、曙光 思想路线上的拨乱反正与平反冤假错案

回顾胡耀邦组织真理标准大讨论	孟 凡(3)
我所经历的真理标准讨论	吴 江(10)
1979 年理论工作务虚会追忆——真理标准讨论第二阶段	吴 江(23)
党内高层一次真正民主的会议——回忆十一届三中全会前 中央工作会议上杨西光、王惠德和我的三次联合发言 ...	于光远(36)
强调科学思想 充分发扬民主——对十一届三中全会前 中央工作会议精神的两点体会	于光远(43)
我亲历经济理论上的一段拨乱反正	吴 江(55)
耀邦指导我们起草中央文件——胡耀邦与“精神文明建设决议”	郝怀明(63)
“皇甫平”文章的背景与论争	周瑞金(81)
陆定一晚年的几点反思	陆 德(88)
胡绳病中来信和他最后关注的一个问题	吴 江(98)
胡耀邦与平反冤假错案	戴 煌(107)
“六十一人案”平反昭雪的前后	戴 煌(127)

二、潮涌 全面经济体制改革

经济改革是怎样搞起来的——为纪念改革开放三十周年而作	田纪云(141)
-------------------------------------	------------

八十年代经济改革十大措施——为纪念改革开放三十周年而作	田纪云(153)
郑炎潮经济理论的创新与遭遇	陈 敏(164)
年广九与“傻子瓜子”的两次沉浮	邱 健(178)
雇工是怎样获得“准生证”的	徐庆全(189)
一九八八年物价闯关前后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200)
深化改革是中国的唯一出路	高尚全(206)

三、蓝图 政治体制改革

邓小平的政治体制改革蓝图及其实践	吴 敏(221)
李维汉痛定思痛疾呼反封建	余焕椿(230)
国务院大院的记忆	田纪云(239)
袁庚谈政治体制改革试点体会	关 山(242)
八十年代改革开放的决策机制	李树桥(253)
最早的村委会诞生追记——探访村民自治的发源地	
广西宜州合寨村	徐 勇(261)
首例村民罢免村官的故事	李昌平 赵 岩(269)

曙

思想路线上的拨乱反正与
平反冤假错案

先

回顾胡耀邦组织真理标准大讨论

◎孟 凡

1977—1982年，我先后任中央党校校刊编辑室副主任、理论研究室副主任，在胡耀邦同志领导下，分管《理论动态》的工作，对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情况比较熟悉。下面就我在理研室和《理论动态》工作中所接触到的一些情况作一些简要的回顾。

邓小平打破“两个凡是”禁锢，胡耀邦站在思想解放最前列

早在1977年4月，邓小平就针对“两个凡是”，提出“用准确的完整的毛泽东思想来指导我们全党全军和全国人民”，点燃了思想解放运动的火炬。后来他又多次表明反对“两个凡是”的立场和态度。1978年5月，当胡耀邦和《理论动态》开展真理标准讨论面临着巨大压力时，邓小平鲜明而坚决地表示对这一讨论的支持，说《理论动态》是好班子，读了一些书，不要搞散了。他说他原来没有注意这篇文章，后来听说有不同意见就看了一下，这篇文章是马克思主义的。争论不可避免，争得好，根源就是“两个凡是”。

正是小平同志在历史转折的关键时刻，抓住全党全国最紧迫的决定性环节，作出了战略决断。而耀邦同志则是在历史转折的关键时刻，站在思想解放运动最前列的冲锋陷阵的勇士。

胡耀邦是在“文革”结束之后，走上党校领导岗位的（中共中央党校1977年3月复校，3月3日中央政治局决定胡耀邦任中央党校副校长，主持日常工作）。他以大无畏的政治胆略和理论勇气抓了几件可以称之为真理标准讨论的序幕的大事：

第一，把学风建设放在首位。1977年6月4日，耀邦同志在一次座谈会上说：“我注意的是，三五年把科学态度搞好。这个搞不好，我们党还可能走弯路。”这里所讲的科学态度，就是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他正是站在



曙光

这样的高度来抓党校的复校工作的。



1978年12月18日至22日，胡耀邦在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上被增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新华社稿）

亲自领导着手平反党校的冤假错案，首先是为被康生、陈伯达等人打成“反动组织”涉及几百人的一个群众组织平了反，进而为50年代被错划成“右派分子”的99名学员和工作人员平了反。这两件事在全国起了示范和带头作用。1977年10月7日，在粉碎“四人帮”一周年时，《人民日报》以整版篇幅发表杨逢春、叶扬、陈中的署名文章：《把“四人帮”颠倒了了的干部路线是非纠正过来》，在全国范围内引起强烈反响，此文是耀邦同志亲自策划指导，根据他的谈话精神写成初稿，前后修改达17次（《人民日报》的同

第二，在耀邦同志的支持和领导下，中央党校首先揭开康生问题的盖子。粉碎“四人帮”后的一段时间内，康生在中央党校扶植的领导班子还在台上，上面还有人保，要揭发康生，也是需要极大的政治勇气的。当中央党校一些同志给康生贴小字报时，耀邦说：“既不提倡，也不禁止。校内外同志都可以看。”通过在校学员一传十、十传百，很快传播到全国，形成势不可当之势。后来中央党校揭批查办公室整理了群众揭发的康生材料，直接报送中央政治局常委，导致三中全会揭露康生问题，由中央纪委立案调查处理。

第三，耀邦同志领导下的中央党校率先吹起组织路线拨乱反正的号角。在校内揭、批、查的基础上，耀邦

志也参加了修改)才定稿。

第四,耀邦同志倡议并亲自指导创办中央党校内部理论刊物《理论动态》,并把它作为思想路线拨乱反正的重要阵地。《理论动态》于1977年7月15日创刊,发行主要对象是地级以上领导干部,后来扩大到基层。《理论动态》创刊后,由于注意抓重大的理论问题和现实问题,敢于破除迷信,说真话,受到绝大多数领导干部的热烈欢迎,老同志反应尤为强烈,发行量剧增。很多重要文章,先后被中央各报以“特约评论员”“本报评论员”“社论”名义转载,新华社转发全国,成了思想解放运动的号角。

第五,在中央党校教学中,耀邦同志最早提出哲学课与党史课要坚持“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1977年11月的哲学课程批评了过去10年来以个人迷信取消实践检验,用权力标准代替实践标准的做法;1977年9月22日,耀邦同志听取中央党校党史教研室、党建教研室汇报时就明确提出,党史要着重讨论九、十、十一次路线斗争的一些问题,“最好能写出个稿子,当文章发表也可以”。后来他布置成立一个组(吴江任组长,缪楚黄、周逸任副组长),提议先搞出个方案来。对编写提出两项要求:一是完整地准确地运用毛泽东思想,二是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1978年1月中旬,小组根据耀邦提出的指导思想和设计的框架写出初稿,明确提出:“应当以实践作为检验真理是非的唯一标准,对‘文化大革命’应采取一分为二的分析态度”(当时对“文化大革命”还是持肯定态度的,直到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全党才改变了对“文革”的看法)。胡耀邦12月26日对这个提要作了批示:“拿给大家讨论去,议论纷纷,有好处。”之后,编写组根据胡耀邦的意见,对这个提纲又作了充实和修改,在吴江主持下邀请部分学员代表座谈征求意见。1978年4月中旬,中央党校校委决定把写成的二稿,在“党的学说”的10天课程中发给学员阅读、讨论。这样不仅使学员初步掌握了真理标准,推动了他们的思想解放,而且通过他们,在全国范围内产生了积极的广泛的影响。

第六,在真理标准问题大讨论之前,耀邦同志就组织了两篇明确论述实践是检验真理标准的文章。第一篇是邵华泽所写的《文风和认识路线》,《理论动态》第31期(1977年12月15日),《人民日报》1978年1月9日转载。这是在拨乱反正中明确提出实践是检验真理标准并联系实际加以阐述的最早的一篇文章,所以胡耀邦非常重视,并给予肯定的评价。他对我说:“这篇文章写得好,提出了一个很重要的问题,把文风问题提到认识论的高